

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的羨余现象*

麻 彩 霞

[提要] “是……有”“在/有……有”“说/道……么道”“么道说”“了有来”“因/为……(的)上头/上”“因此上”是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羨余现象。这种现象是元代北方汉语口语的实际反映，是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结果，体现了当时汉语口语的语法特点。羨余现象在直译体文献中比较常见，元明清时期的非直译体文献里也曾出现，不过羨余现象及其格式最终没有在汉语通用语里保留下来。通过对羨余现象的探讨，不但能够认清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一些语法形式产生的根源，而且能够了解元明时期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状况，有助于认识当时北方汉语的语法面貌。

[关键词] 蒙古语 汉语 直译体文献 羨余现象 语言接触

一 引 言

元明时期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混杂语言，其词汇使用汉语白话词汇，语法则体现出汉语和蒙古语两种语言语法的杂糅。这种混杂语言是由蒙古语、汉语接触而产生的语言变体，太田辰夫（1991:202）称之为“蒙古语直译体”。体现这种语言变体的代表性文献有《元典章》《通制条格》《蒙古秘史》《华夷译语》和元代的白话碑文等。本文主要选择《蒙古秘史》^①《元典章·刑部》^②《通制条格》^③和元代的白话碑文^④作为考察语料，对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的“是……有”“在/有……有”“说/道……么道”“么道说”“了有来”“因/为……(的)上头/上”“因此上”几种羨余现象进行研究。

蒙古语直译体文献的研究，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外的研究成果如小泽重男（2004）是研究蒙古语直译体文献较为重要的著作。山川英彦（1976）^⑤、太田辰夫（1991）和佐藤喜之（1993）^⑥也对《蒙古秘史》《华夷译语》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通俗类书的文献整理及语言文学研究（19ZDA248）”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蒙古族直译体历史文献《蒙古秘史》语法研究（17BMZ031）”的阶段性成果。邢向东先生和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① 《蒙古秘史》虽然是明初被译成汉语，与《元典章·刑部》《通制条格》和元代的白话碑文有时间差异，但其语体与其他几种文献是相同的，而且一般认为译者火原洁、马沙亦黑是元末明初人，所以，由他们翻译的《蒙古秘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元代汉语的语言面貌。

^② 本文《元典章·刑部》参考佚名（2010）。

^③ 本文《通制条格》参考黄时鉴（1986）。

^④ 本文考察的元代白话碑文见于蔡美彪（2011, 2017）及祖生利（2000）。

^⑤ 指山川英彦 1976 年的论文《元朝秘史总译语法札记》，转引自李崇兴、祖生利（2011:360）。

^⑥ 指佐藤喜之 1993 年的论文《〈元朝秘史〉、〈华夷译语〉总译的“么道”》，转引自李崇兴、祖生利（2011:362）。

等直译体文献的语法现象进行过考察，他们的研究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余志鸿（1988），祖生利（2000），李崇兴、祖生利（2011）等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分别对《蒙古秘史》、白话碑文和《元典章·刑部》等直译体文献的语法现象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探讨。虽然前人对直译体文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专门研究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羨余现象的成果我们几乎还没有看到。关于羨余格式也只有少数学者提及，如祖生利（2000）提到，白话碑文中存在“有……有”“做……做”“道……么道”之类的赘余形式。之后，祖生利（2004）提到了蒙汉赘译的格式“道/说/倚（着）……么道（道）”。李崇兴、祖生利（2011:300-301）指出“在/有……有”是蒙汉赘译。曹广顺、遇笑容（2014:153）提到了“判断词后置与迭加式判断句”，即“是……是/有”格式。张安生（2007）列举了“……说着说着”这一羨余格式的用例。

关于这种“羨余现象”，学界对其命名有不同的说法。祖生利（2000）及李崇兴、祖生利（2011）称之为“赘余形式”“蒙汉赘译”“蒙汉合璧的形式”；曹广顺、遇笑容（2014）则把“是……是/有”格式叫作“判断词后置与迭加式判断句”。笔者称之为“羨余现象”。所谓“羨余现象”，是元明时期蒙古语、汉语接触造成的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指表示某一种语义时，句子里同时出现两个分别来自蒙古语和汉语但意义相同、用法相当的成分。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出现了重复，其中表示蒙古语意义或用法的成分是多余的，但对于蒙古语而言这些成分不是羨余成分，而是语法的必要成分。“羨余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汉语里夹杂蒙古语成分的情况，一般的混合现象在语义上并不造成重复。例如：

（1）离了札木⁺合太祖行来了。（《蒙古秘史》^①卷四 130 节）

音译：札木⁺合答察⁺合⁺察周 成吉思⁺合罕突^舌儿 亦^舌列罢

旁译：人名 行 离 着 太祖 皇帝行 来 了

例（1）总译中的“行”表示动作行为涉及的处所，是标记蒙古语与一位格^②的词，是体现蒙古语语法的成分。“太祖行来了”用现代汉语可以翻译成“投奔到成吉思汗处来”。在这句话里，虽然有反映蒙古语语法的成分“行”，但从形式上看，并没有出现两个表示相同语法意义的成分，所以，“行”不能去掉，一旦去掉，句子就不成立了。

本文所说的直译体文献中的羨余现象如：

（2）因你助你父亲收集百姓上头。所以与你扯^舌儿必名分。（《蒙古秘史》卷九 212 节）

音译：赤 兀鲁思⁺忽^舌里牙^勒敦 额赤格迭微 幹^舌罗〔额〕列 只兀^舌儿 孛仑

旁译：你 百姓 共 收 集 父 行 只 翘 做

音译：只^秃都周 兀鲁思⁺忽^舌里牙^勒都^黑三 秃刺 扯^舌儿必 捏^舌列 幹克罢 者

旁译：共 拽 着 百姓 共 收集 了 的 上头 官 名 名 分 与 了 也者

例（2）《蒙古秘史》总译中的“因”和“上头”形成了羨余。“因”是汉语的因果连词，“上头”是表示蒙古语原因后置词 tula 意义的成分，两个词都表示原因，所以，构成了语法

^① 本文《蒙古秘史》的用例均引自阿尔达扎布（2005）。用例中有的把音译、旁译和总译都列出来，为的是更直观地显示总译中“行”“上头”“了有来”“么道”“有”等语法成分的由来。“总译”二字文中未标，例句即是“总译”。

^② 文中涉及的蒙古语语法理论主要参考清格尔泰（1991）、嘎日迪（2006）和祖生利（2000）。

成分的重复。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上头”是多余的成分，可以去掉。

学界对近代汉语里一般的蒙古语、汉语混杂现象关注得相对较多，但对于羨余现象，虽然前贤曾经提及，但都比较零散，均没有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探讨。所以，笔者认为，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二 羨余现象的类型

综合前人提到的直译体文献中的羨余现象以及我们在考察直译体文献时所发现的其他羨余现象，主要有“是……有”，“在/有……有”，“说/道……么道”“么道说”，“了有来”以及“因/为……（的）上头/上”“因此上”五类。下面逐一讨论。

（一）“是……有”

“是……有”这种格式为判断句。例如：

- (3) 僥是怯薛歹有。(《通制条格》卷第六，引自黄时鉴 1986:210)
(4) 是人命的勾当有。(《元典章·刑部》卷之一，引自佚名 2010:582)
(5) 军马勾当不似民间勾当，是紧急大勾当有。(《通制条格》卷第六，引自黄时鉴 1986:92)

这一格式中的“是”为汉语的判断动词，“有”是蒙古语表示存在和判断的实义动词 a-、bü-“是、存在、有”的直译。这样，后面的“有”就与前面的“是”形成了重复。从汉语语法的角度看，“有”是多余的成分，可以去掉。“有”在古代和近代汉语中就有表示“领有”“存在”“是”的意思，直译体文献用“有”来翻译蒙古语实义动词 a-、bü-是很合理的。

（二）“在/有……有”

这种格式是表示存在和领有的结构。笔者在《蒙古秘史》《元典章·刑部》里发现了如下用例：

- (6) 汪古儿说。赏赐教拣呵。巴牙兀^惕姓的兄弟每。都散在各部落里有。我欲要收集者。
(《蒙古秘史》卷九 213 节)
(7) 若有生得好妇女。将来教洗浴了。挤牛羊乳呵中有。(《蒙古秘史》卷七 189 节)
(8) 如今这三种篾^音儿乞^惕脱^黑脱阿。在不兀刺客额^音儿地面里有。歹亦^音儿兀孙在斡^音儿
洹薛凉格河两间。塔^中浑阿^音刺勒的地面里有。^音合阿台答^音儿马刺。在^中合^音刺只客
额^音儿地面里有。(《蒙古秘史》卷三 105 节)
(9) 内有八处州判、县尉，更有三处下县主簿兼尉有。(《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三，引
自佚名 2010:742)

上例句末的“有”仍然是用来表示蒙古语实义动词 a-、bü-的意义，即“存在、有”，与前面的动词“在”“有”形成重复，造成蒙古语、汉语同类成分羨余。在《通制条格》和白话碑文里没有发现此类用例。

（三）“说/道……么道”和“么道说”

这种格式主要用于引语，包括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说/道……么道”和“么道说”相当于言说动词。例如：

- (10) 蒙力_克说他的女子行咱索时。……不若只推称春间马瘦。且养马不去么道。(《蒙古秘史》卷五 168 节)
- (11) 圣旨里道：“使教杀了者。”么道不曾有来。(《元典章·刑部》卷之三，引自佚名 2010:616)
- (12) 那个根底说：“……杀了呵，‘他自抹死也。’么道，你官人每根底说者。”(《元典章·刑部》卷之四，引自佚名 2010:622)
- (13) 监察每文书里说有，“……这医人每，教太医院立定体式，将他每试了医人的勾当，学会的委付”。么道说有。(《通制条格》卷第二十一，引自黄时鉴 1986:264)
- (14) 更，这的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平遥太平崇圣宫圣旨碑 1309 年，引自蔡美彪 2017:155)
- (15) 更，这和尚每说有圣旨么道，无体例勾当休做者。(邵阳光国寺圣旨碑 1318 年，引自蔡美彪 2017:195)

上述例句中，“么道”是用来表示蒙古语称引意义的词，它与前面的汉语言说动词“说/道”形成重复，造成蒙古语、汉语同类成分累余。张安生（2007）认为：“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最有可能是在阿尔泰语、主要是蒙古语族语的影响下产生的；其渊源当可以追溯到近代蒙式汉语中‘说’的后置式引语动词的用法。”李崇兴、祖生利（2011:4）认为：“‘么道’是为翻译蒙古语引语动词生造出来的，纯正的汉语文献中见不到。”祖生利（2004）指出：“作为 ke·e 对译形式的‘么道’虽然不是纯粹的元代汉语口语词汇，但很可能在蒙古人所说的‘蒙式汉语’中实际地使用，而不仅仅是一种书面的对译形式。”祖生利先生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在元代以口语为基础的文献——贯云石的《孝经直解》^①中找到了三个“么道”的用例，如：

- (16) 因这般上头得一家人欢喜，奉侍父母呵，不枉了有么道。(《孝经直解》孝治章第八，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3)
- (17) 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孝经直解》开宗明义章第一，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0)
- (18) 在人头上行呵，常常的把心行着么道。(《孝经直解》诸侯章第三，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0)

关于“么道”，祖生利（2004）认为，其汉语的字面意思是“这般说”“那般说”“如此说”，其中“么”是个指示代词，犹“这么、那么”；并指出，在唐宋文献中“么道”的说法并不常见，同期禅宗语录中更多地说成“与摩（么）道（说）”“恁么道（说）”，元代汉语里常见的说法是“这般道（说）”或“那般道（说）”。我们支持上述观点。笔者对元代《全元曲》（徐征等 1998）、《元刊杂剧三十种》（宁希元 1988）等文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找到“么道”的用例，但在口语的实际使用中应该是存在的，有待进一步考察。

（四）“了有来”

直译体文献里存在“了有来”这种复合助词形式，构成表叙述的陈述句。例如：

^① 本文参考的《孝经直解》出自刘坚、蒋绍愚（1995）。

- (19) 在先，为做贼说谎上头，完泽笃皇帝交各还元籍去了有来。（《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一，引自佚名 2010:710）
- (20) 还俗和尚先生每，弟兄析居，放良来的，这等户每，不拣是谁休拘收者，么道圣旨行了有来。（《通制条格》卷第二，引自黄时鉴 1986:17）
- (21) 世祖皇帝登了宝位，在后完泽笃皇帝登了宝位呵，多人每犯着上位名字的教更改了有来。（《通制条格》卷第八，引自黄时鉴 1986:126）
- (22) 释教都总统名分里委付了有来。（大都崇国寺劄付碑——宣政院劄付 1366 年，引自蔡美彪 2017:255）

“了有来”在我们考察的几种直译体文献里的用例数量不多，共出现了五例。但在《蒙古秘史》的旁译里还是比较常见的。

“了”是汉语表示动作或性状实现的体助词，在直译体文献中可以表示蒙古语过去时附加成分的语法意义。“有来”也是直译体文献中对译蒙古语过去时附加成分 -ba/-be、-ju·u/-jü·ü、-ju·ui/-jü·üi 语法意义的助词，多出现在句末，为羨余成分。李崇兴、祖生利（2011:304）指出：“在《蒙古秘史》、《华夷译语》旁译中，中古蒙古语动词过去时形式……有时也用‘V 有’、‘V 了有’及‘V 了来’、‘V 有来’‘V 来有’、‘了来有’等对译。”也就是说，“有来”与前面表示动作完成的汉语助词“了”的作用相同，所以，也就造成了蒙古语、汉语同类成分的羨余。在元明清时期的非直译体文献《元曲选》《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中，我们均没有检索到“有来”的用例，但在《孝经直解》中发现了“有来”，表示的是过去时。例如：

- (23) 天下诸侯都来添气力祭奠有来。（《孝经直解》圣治章第九，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4）

这说明，羨余成分“有来”主要出现在直译体文献中，但在口语中也应该实际存在。

(五) “因/为……(的) 上头/上”和“因此上”

这种格式主要构成因果复句，可以分成以下两小类。

1. “因/为……(的) 上头/上”

这一小类中，“因/为”与“(的) 上头/上”之间还有其他成分，没有直接组合在一起，一般出现在因果复句中表示原因。例如：

- (24) 初者別本名只古儿^中豁阿歹。因他射死战马能的上头。赐名者别。（《蒙古秘史》卷四 147 节）
- (25) 因俺巴孩^中合罕被拿时。将^中合答安^中忽图刺两个的名字提说来上头。（《蒙古秘史》卷一 57 节）
- (26) 为你杀弟的上头。你叔父古儿^中罕来征你。（《蒙古秘史》卷六 177 节）
- (27) 为科举的上头前日奏呵，开读诏书行者，么道圣旨有来，……（《通制条格》卷第五，引自黄时鉴 1986:69）
- (28) 为这般上头，把着行踏的圣旨与来。（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 1260 年，引自蔡美彪 2017:103）

- (29) 为我上头。弟兄每休恶了。(《蒙古秘史》卷四 131 节)
- (30) 为这般上头,皇帝根底奏呵,“今后休教放者。”圣旨有来。(《元典章·刑部》卷之一,引自佚名 2010:578)
- (31) 世祖皇帝以来定到的断例,后头自元贞元年以来,因做好事上,好生失的宽了有。
(《元典章·刑部》卷之一,引自佚名 2010:578)

2.“因此上”

这一小类是来自蒙古语、汉语的两种成分直接混合在一起,一般出现在因果复句中表示原因。例如:

- (32) 名赤都⁺忽〔勒〕孛阔赤都⁺忽〔勒〕孛阔娶的妻多。儿子多生了。因此上做了篾年巴^音阿邻姓氏。(《蒙古秘史》卷一 41 节)
- (33) 因此上骑着一个青白色。断梁疮秃尾子的马。顺着斡难河去。到巴勒淳阿刺名字的地地面里。结个草庵住了。(《蒙古秘史》卷一 24 节)
- (34) 因此上将回去与也速该把阿秃儿做了妻。(《蒙古秘史》卷一 56 节)

笔者认为,这里的“因此”是“因为这样”的意思,表示原因,“上”在直译体文献里经常用来对译蒙古语后置词 tula,也是表示原因,这样“因此”与“上”就形成了羨余。

上述例句中的“上头/上”为助词,是用来表示蒙古语原因后置词 tula 和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 -ar/-bar 的意义。蒙古语的后置词 tula,表示原因或目的,相当于汉语的“因”“为”。蒙古语形动词的工具格可以表示动作实现的原因,在直译体文献里,蒙古语形动词工具格附加成分 -ar/-bar 一般用汉语的“上头/上”来表示,这就与例句前部汉语的“因/为”等重复,造成羨余。元代表示原因的后置词“上头/上”不只是出现在直译体文献中,在非直译体文献如直讲体、会话体文献及元曲中也可以见到大量用例。祖生利(2004)认为,非直译体文献中“上头/上”表原因的后置词用法不是元代汉语因果句自身发展的产物,因为汉语自上古至唐宋使用的主要因果连词和结果连词均没有出现“上头/上”,到了元代突然出现,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蒙古语表原因的后置词影响和融入的结果。这样的看法我们也是赞同的。

三 羨余现象的成因

本文探讨的虽然是一种特殊的蒙古语、汉语成分混杂的现象,但就其产生的原因而言,与一般的蒙古语、汉语混杂现象有共同之处。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学界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翻译蒙古语原文的产物,仅是纸面上的东西^①;另一种认为是当时口语的客观反映,是当时蒙古语和汉语混杂语言的实际体现(李崇兴 2001; 祖生利 2005)。对于以上两种观点我们倾向于后者,即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是蒙古语、汉语接触造成了两种语言成分的杂糅。这种混杂语言在当时现实的口语中是实际存在的,它不仅仅出现在书面上,只不过

^① 太田辰夫(1991:202)在论述“关于汉儿言语——试论白话发展史”时指出,有一种见解认为,蒙古语直译体只在纸上存在,不曾在口头上使用过。李崇兴(2001)也谈到,对于元代出现的这种古怪的公文,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机械地翻译蒙古语原文的产物,是纸面上的东西。由此可知,学界有部分学者支持第一种观点。

对于一些直译体文献而言，有蒙古语原文作为基础和参照。也就是说，直译体文献中的这类现象，表面上看是由对译蒙古语造成的，但实质上应该是元代北方口语的客观反映。在进行具体阐述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先认清羨余现象与翻译蒙古语的关系，然后再进一步说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 羨余现象与翻译蒙古语的关系

通过对直译体文献的考察，我们发现羨余现象似乎与翻译蒙古语有直接关系。参照《蒙古秘史》的蒙古语原文音译和旁译，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有的羨余现象就是译者在把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时造成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蒙古语意义，汉语翻译一般采用意译，同时为了忠实于蒙古语原文或体现原文的特点，也保留了蒙古语表达这一意义成分的对译。这样，对译蒙古语的语法成分与翻译蒙古语语法意义的汉语意译成分形成了重复，也就造成了蒙古语、汉语混合的羨余格式。例如“因……上头”里的“上头”，在宋代以前的汉语里，方位词“上头”并没有表示原因的用法。在《蒙古秘史》里，“上头”常用来对译蒙古语表示原因的附加成分和形动词工具格的附加成分，这两种附加成分都可以表示原因，这就与汉语里的前置连词“因/为”形成了重复。例如：

(35) 因孙^勒都歹种的人塔孩把阿秃儿。太祖处有恩的上头。与了一百只儿斤百姓。(《蒙古秘史》卷七 186 节)

音译：孙^勒都歹 塔⁺孩·把阿秃^舌仓 土撒因 亦讷 秃刺 你刊 札温 只^舌儿吉泥 鞍^舌罢

旁译：姓 人名 勇士 的 恩 的 他的 上头 一 百 姓 行 与 了

例(35)中蒙古语原文音译的“秃刺”就是中古蒙古语表原因的后置附加成分 tula。总译中前面用汉语的连词“因”表示原因，后面仍保留了直接对译蒙古语表原因的 tula，由于是用在代词领格后，所以译为“的上头”，因此，构成了“因……的上头”的格式，“上头”与汉语的前置连词“因”形成羨余。

又如“说/道……么道”，《蒙古秘史》里用它对译中古蒙古语的引语动词 ke·e。ke·e用在直接引语后，表示直接引述，意思为“说”“如此说”“那样说”。我们认为，用“么道”对译 ke·e主要是因为两者的意义基本相同。“么道”与句子前部汉语原有的言说类动词“说/道”意思相同，这就造成了羨余。例如：

(36) 成吉思对亦巴⁺合说。……想着这有功的道理直至子子孙孙。亦巴⁺合位子里休教
断绝了么道。(《蒙古秘史》卷八 208 节)

音译：亦巴⁺合答 鸣^舌话列^舌论……兀^舌鲁^中浑 兀^舌鲁^中合 古^舌儿帖列

旁译：夫人名 行 说 子孙的 子孙 行 直到

音译：亦巴⁺合因 鞍^舌罗 不 塔速^勒秃⁺孩 客延 札^舌儿里 黑^勒罢

旁译：夫人名 的 位子 休 断了者 么道 圣 旨 做了

又如“在/有……有”格式中的后一个“有”也是来自对蒙古语语法成分的直译。这个“有”一般是对译蒙古语表存在和判断的实义动词 a-、bü- (本义为“有、存在、在、生活、是”)的成分。因此，这个“有”与前面的“在”或“有”重复，形成羨余。例如：

(37) 多半与札木^和合一同在这里有。(《蒙古秘史》卷七 194 节)

音译: 忙^和豁仑 幹笼勤 札木^和合鲁阿 额你迭 必丹突^舌儿 備

旁译: 达达的 多 半 人名 一 同 这里 咱每行 有

例(37)中,“有”对译的是蒙古语实义动词 bü-,总译中保留了原文动词的直译“有”,与汉语原有的“在”形成赘余。

但赘余现象也不完全是简单直译原文的结果,《蒙古秘史》总译中出现的赘余格式也并不都是直接保留蒙古语成分的直译而出现的。例如:

(38) 在先有可倚仗的人额^勒只吉歹曾在宿卫上行。被宿卫的拿了有来。(《蒙古秘史》

卷九 229 节)

音译: 只^勒答 客^下帖兀伦 迭格温 逐步^和忽 孛仑 客^下帖兀 (舌列)[列] 客^舌儿

旁译: 晚 宿卫 的 从 上 行 的 做 宿卫 行 怎

音译: 把^舌里^黑答刺^阿

旁译: 被 拿 来

例(38)旁译在翻译蒙古语过去时附加成分“刺阿”时用的是“来”,而总译却为“了有来”。这说明总译中出现的赘余形式“了有来”并不完全是直接保留旁译中的直译成分而来的。如果是直接保留旁译,那么,总译就应该是“被宿卫的拿来”,而例(38)的总译却是“被宿卫的拿了有来”。“来”或者“有来”都可以对译蒙古语过去时附加成分,而“了”是汉语表示过去动作完了或完成时经常使用的助词。旁译仅是蒙古语原文词语的直接对译,而总译既要忠实于蒙古语原文,还要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所以,容易造成赘余现象。

(二) 赘余现象的口语基础

虽然在直译体文献中,我们看到有些赘余现象是以蒙古语原文作为基础直译造成的,但不能单纯地认为这种现象就是翻译蒙古语产生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直译体文献里也存在某些赘余现象不是直接对译蒙古语原文而来的。通过对《蒙古秘史》的考察,笔者看到了一些并非直译蒙古语原文而来的赘余现象,如“因……上头”这样的格式:

(39) 因神明告的上头。教我眼里见了。(《蒙古秘史》卷三 121 节)

音译: 札阿^舌隣 亦^舌列周 纳都^舌儿 你敦都^舌里颜 兀者兀^勒罢

旁译: 神 告 来 着 我 行 眼 自的行 教 见 了

例(39)中,蒙古语原文音译并没有出现表示原因的后置附加成分,总译中却出现了“因……的上头”,很显然,这并不是对译蒙古语原文而造成的,而是意译的结果。

其二,在元代以口语为基础的非直译体文献中,赘余现象也客观存在。李崇兴(2001)正是以此为依据来证明元代直译体公文有现实的口语基础。一般认为,元代以口语为基础的典型文献是直讲体和会话体文献,代表性的如《孝经直解》《老乞大》《朴通事》等。江蓝生先生在为李泰洙的《〈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所作的序言(李泰洙 2003:1)中提出:“会话课本《老乞大》《朴通事》的语言跟直讲体十分接近,比直讲体还要口语化,更能反映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真实面貌。”在直讲体和会话体这两种文献里,我们都发现了赘余现象的例证:

- (40) 孝道的勾当，是德行的根本有。（《孝经直解》开宗明义章第一，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0）
- (41) 为这般上头呵，无法度的言语休说，无道理的勾当不行有。（《孝经直解》卿大夫章第四，引自刘坚、蒋绍愚 1995:51）
- (42)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是汉儿人有。（古本《老乞大》，引自李泰洙 2003:120）
- (43) 因那上头众人再不曾劝，信著他胡使钱。（古本《老乞大》，引自李泰洙 2003:188）

那么，为什么以口语为基础的非直译体文献会出现以上这样的羨余形式呢？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元代汉语口语的实际反映，某些格式在当时的汉语口语中应该已经在使用了。太田辰夫（1991:200-201）认为，《元典章》《通制条格》等直译体文献是真正以当时的“汉儿言语”为基础写作的，是元明时期“汉儿言语”的典型代表。它不是只在直译体文献中存在，在口语里也在实际应用，是当时蒙古、汉两个民族使用的共通语。太田辰夫所说的元明时期的“汉儿言语”就是当时蒙古语和汉语混杂的语言。李崇兴（2001）指出：“对于元代出现的这种古怪的公文，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机械地翻译蒙古语原文的产物，是纸面上的东西”，并以直讲体和会话体文献存在蒙古语成分为依据，认为元代确有一种夹杂蒙古语成分的特殊口语在北方流行，这种特殊的口语是产生特殊书面语——直译体公文的现实基础。祖生利（2005）也指出：“元代白话碑文及《元典章》、《通制条格》等中的直译体文牍，过去一般认为是一种脱离口语的书面翻译语体，实际在其纷扰缠杂的混合语言现象背后，有着蒙古语底层的合理依据，是蒙古人所操蒙式汉语的书面表现，具有现实的口语基础。”祖生利所谓的“蒙式汉语”实际上也是指当时蒙古语和汉语的混杂语言。虽然前人已经提出直译体语言有现实的口语基础这一观点，但对此进行深入剖析的成果不多。我们认为，羨余现象与一般的蒙古语和汉语混合的现象一样，都是当时口语的实际反映，理由主要是：

首先，在《老乞大》中我们可以得到元代口语使用的是“汉儿言语”的直接证据。如古本《老乞大》（李泰洙 2003:118）：“恁是高丽人，却怎么汉儿言语说的好有？”又如（李泰洙 2003:120）：“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著的是汉儿言语。咱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田地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再如（李泰洙 2003:147）：“底似的汉儿言语说不得的上头，不敢言语。”还如（李泰洙 2003:162）：“俺沿路来时，好生多得他济。俺汉儿言语不甚理会的，路上吃的马匹草料以至安下处，全是这哥哥生受。”这说明，当时的口语应该就是蒙古语和汉语混杂的“汉儿言语”。而且在古本《老乞大》里，我们也确实看到了这种蒙古语、汉语混合的形式，如上文所举。所以，直译体文献中表面上看是由翻译蒙古语原文而产生的蒙古语、汉语混合的羨余现象，实际上是有元代北方汉语口语作为基础的，应该是当时汉语口语的直接体现。

其次，据有关文献记载，元朝建立之前的“大蒙古国”时期，汉语口语里已经出现了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现象。据南宋彭大雅的《黑鞑事略》^①记载（许全胜 2014:62）：“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便随鞑人行打，恣作威福，讨得撒花，讨得

^① 本文参考的为许全胜（2014）《黑鞑事略校注》。宋人称“蒙古”为“黑鞑靼”，彭大雅、徐霆二人分别在 1232 年和 1235-1236 年作为南宋赴蒙古使节随员出使到蒙古。彭大雅是书状官，先写下了书稿，徐霆随使归来将自己的见闻记录与彭大雅书稿互相参照，以彭稿为定本，把自己的不同记载作为疏（注释）写在各有关事项之下，遂成《黑鞑事略》一书。

物事吃。”又载（许全胜 2014:74）：“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通过《黑鞑事略》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大蒙古国”时期的汉语口语里已经出现了蒙古语、汉语接触的现象。而《元典章》《通制条格》《蒙古秘史》等直译体文献均是元代或明初的文献，所以说，这些直译体文献里的蒙古语、汉语混合的羨余现象应该是当时北方汉语口语的客观反映。

再次，从直译体文献和直讲体文献使用的目的来看，羨余现象也应该是以现实的汉语口语作为基础的。像《元典章》《通制条格》等直译体文献主要是关于元代法律政令的公文，是维护元朝政治统治的法典，它们要在民间通行，必须要考虑到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如果不采用当时的口语，势必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还有《孝经直解》等直讲体文献是元代经筵的讲稿，贯云石在《孝经直解》“自叙”（刘坚、蒋绍愚 1995:49）中指出，该书的写作目的就是用俗白浅近的语言宣传《孝经》，“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如果这些直译体和直讲体文献的语言不是当时口语的反映，这样的目的恐怕也很难实现。

综上，我们认为，羨余现象实际上是有元代北方汉语口语作基础的，而且它们是汉语和蒙古语杂糅的结果。羨余格式中表示蒙古语动词的成分都是在句末出现，体现的是蒙古语的OV语序，与汉语的VO语序杂糅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羨余形式。如“是……有”格式，汉语的系词判断句一般是“S+是+N”，而蒙古语的语序是“S+N+是/有”，两种判断句糅合在一起，就形成了“S+是+N+是/有”格式。有的则是蒙古语的后置附加成分与汉语的前置语法成分杂糅在一起构成的，如“因/为……（的）上头/上”。蒙古语一般是由各种后置的附加成分来表达语法意义，而汉语在表达一些语法意义时常常使用前置的词语，如表示因果关系的原因分句中，一般使用前置的因果连词“因为”“为”等，“因/为……（的）上头/上”这种格式就是汉语的前置连词和蒙古语表原因的后置词糅合在一起造成的。直译体文献为我们分析这种羨余现象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其中对译蒙古语原文而出现的羨余现象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这些语料正好可以说明“是……有”“在/有……有”“说/道……么道”“因/为……（的）上头/上”“因此上”格式中的“有”“么道”“上头/上”的来源和语法意义。如果不参照蒙古语直译体文献原文的音译和旁译，我们可能也不是很好解释和判断。通过对例（35）（36）（37）的分析，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上头”“么道”“有”就是用来表示蒙古语语法的成分，是体现蒙古语语法特征的词语。所以，这种有蒙古语原文音译和旁译的直译体文献为分析羨余现象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随着直译体文献的流传，客观上也促进了这种蒙古语、汉语混合的羨余现象在口语中的通行，扩大了当时汉语口语的影响力。简而言之，口语应该是羨余现象产生的基础，书面的直译体是现实口语的反映，书面语对口语也具有反作用，随着书面直译体文献的传播，对当时的口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 羨余现象的发展

一种语言现象出现以后，其发展无非就是两种：一种是成为有生命力的格式，在语言中保留沿用下来；另外一种就是由于使用频率或使用范围的限制，逐渐消失。蒙古语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羨余现象的发展趋势到底是哪一种呢？它对近代汉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这些也应该是我们需要厘清的问题。

通过对元明清时期一些有代表性的非直译体文献，如《全元曲》《水浒传》《红楼梦》和

明清版本《老乞大》^①的考察，我们发现，羨余现象不仅仅在直译体文献里存在，“因此上”“因……的上头”这样的格式在元明清时期的非直译体文献里也出现了。例如：

- (44) 这两个小的，聪明乖觉，都是我心腹之人，因此上则带的这两个人来。(《全元曲·望江亭中秋切鲙》)
- (45) 华阴县里禁他不得，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谁敢上去拿他？因此上，小人们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讨来卖！(《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第一回)
- (46) 我有一个伙伴落后了来，我沿路上慢慢的行着等候来，因此上来的迟了。(《老乞大谚解》，引自李泰洙 2003:117)
- (47) 自己的胡须将已苍白。因此上把平日嫌恶宝玉之心不觉减了八九分。(《红楼梦》第二十三回)
- (48) 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还恋恋的舍不得去。(《红楼梦》第十一回)

即便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会出现“因此上”这样的表达方式。如：

- (49) 人家又是怎么赚的呢？这才有鬼！因此上不到两年，铺子倒了，背了一身臭债，咱两父子还是去给人打工去。(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三家巷》)

又如“说/道……么道”这样的格式对元代汉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祖生利（2004）指出，“引语动词这个本属于蒙古语的语法成分，由于语言接触，也很可能渗透到元代汉语里”，并且以《训世评话》中的用例作为证据，认为“这般说”只是“么道”的口语化说法，“说(道): ……(引语) 这般说”显然是蒙古语引语表达式 “ügüle-rün……(引语) ke-e-” 的翻版，非汉语所固有。这说明，“说/道……么道”这样的格式也促使汉语出现了“说(道): ……(引语) 这般说”这样的格式。

再如“在……有”格式，在《全元曲》中也出现了一些用例。例如：

- (50) 张千，将那厮且拿在一壁有者。(《全元曲·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 (51) 兀那老的，你则在这里有者，我过去见大人去。(《全元曲·十探子大闹延安府》)
- (52) 我来到这妆台背后，原来广寒殿嫦娥在这月明里有。(《全元曲》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 (53) 又不是你家前院后，怎么的唤渡行人在那搭儿有？(《全元曲》陈季卿误上竹叶舟)

虽然“在……有”在非直译体文献中出现的用例数量不多，但还是留下了些许痕迹。后来的北方汉语口语文献，如《水浒传》《红楼梦》中均没有发现，现代汉语口语中也不用这种格式。不过“是……有”这一格式在明代版本的《老乞大》里仍然存在。例如：

- (54)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是汉儿人有。(《老乞大谚解》，引自李泰洙 2003:120)

由上可知，羨余现象在直译体文献里比较常见，在非直译体文献里也不是完全没有。有的羨余格式甚至在明清时期还在使用，有的则催生了一些相似格式的出现，从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方式，对近代汉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些羨余现象及其格式最终还是没有在

^① 本文所说的明清版本《老乞大》即是《老乞大谚解》和《老乞大新释》，均为李泰洙（2003）附录中提供的相关版本。

汉语通用语里保留下来。由于元朝灭亡和民族融合，元代和明初这种蒙汉混杂式汉语日渐式微，由此导致蒙古语、汉语混合的羨余现象逐渐消失。再加上羨余现象及其格式本身的缺陷，即存在多余的成分，违反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所以，必然会走向衰亡。当前只在与阿尔泰语系语言有接触的汉语方言里存在个别格式，如敏春芳、雷雨（2016）谈到的甘肃临夏方言中存在的“是……是”这样的形式。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直译体文献里出现的羨余现象及其格式是由于蒙古语、汉语接触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语法现象，它体现了当时汉语口语的语法特点，是元代北方汉语口语的客观反映。探讨羨余现象及其格式有利于揭示蒙古语直译体文献的语法特点，追溯近代汉语里一些语法格式的源头，有利于认识当今河湟方言和其他一些方言中近似格式的性质。羨余现象是蒙古语语法成分渗入汉语句法的表现，虽然羨余现象及其格式不是很多，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让我们了解蒙古语、汉语的接触融合状况和中古蒙古语对近代汉语产生的影响以及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异现象的发展演变和规律。

参考文献

- [1] 阿尔达扎布. 2005. 《新译集注〈蒙古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2] 北京大学CCL语料库，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三家巷》.
- [3] 蔡美彪. 2011.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4] 蔡美彪. 2017. 《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5] 曹广顺、遇笑容. 2014. 《变与不变——汉语史中语言接触引发语法改变的一些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编辑部编《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八辑)第150-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6] 曹雪芹. 2009. 《红楼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7] 嘎日迪. 2006. 《中古蒙古语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 [8] 黄时鉴点校. 1986. 《通制条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9] 兰陵笑笑生. 1994. 《金瓶梅》，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
- [10] 李崇兴. 2001. 《元代直译体公文的口语基础》，《语言研究》第2期.
- [11] 李崇兴、祖生利. 2011. 《〈元典章·刑部〉语法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12] 李泰洙. 2003. 《〈老乞大〉四种版本语言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13] 刘 坚、蒋绍愚. 1995.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 敏春芳、雷 雨. 2016. 《临夏回民汉语的“S是+N是/不是是”句》，《方言》第3期.
- [15] 宁希元. 1988. 《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 [16] 清格尔泰. 1991. 《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7] 施耐庵. 2010. 《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清)金圣叹批评，南京：凤凰出版社.
- [18] 太田辰夫. 1991. 《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 [19] 吴承恩. 2009. 《西游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 吴敬梓. 2018. 《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1] 小泽重男. 2004.《中世纪蒙古语诸形态研究》, 呼格吉勒图、胡树、南敬铭等译, 贾拉森、吉仁尼格、布仁巴图审校,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22] 徐 征、张月中、张圣洁等. 1998.《全元曲》,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3] 许全胜. 2014.《黑鞑事略校注》,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 [24] 佚 名. 2010.《沈刻元典章》, 北京: 中国书店.
- [25] 余志鸿. 1988.《〈蒙古秘史〉的特殊语法——论元代汉语的时体制》, 《语言研究》第 1 期.
- [26] 张安生. 2007.《西宁回民话的引语标记“说着”、“说”》, 《中国语文》第 4 期.
- [27] 赵义山选注. 2008.《元曲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8] 祖生利. 2000.《元代白话碑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29] 祖生利. 2004.《元代直译体文献中的“么道”》, 《民族语文》第 4 期.
- [30] 祖生利. 2005.《元代蒙古语同北方汉语语言接触的文献学考察》, 载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八辑) 第 52-79 页,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The Redunda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Documents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Mongolian

MA Caixia

[Abstract] “*shi* 是...*you* 有”, “*zai* 在/*you* 有...*you* 有”, “*shuo* 说/*dao* 道...*medao* 么道”, “*medaoshuo* 么道说”, “*leyoulai* 了有来”, “*yin* 因/*wei* 为...(*de* 的) *shangtou* 上头/*shang* 上” and “*yincishang* 因此上” are cases of the redundant phenomenon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written in the style of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Mongolian. This phenomenon is an actual reflection of the northern variety of spoken Chinese in the Yuan dynasty. It is a result from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Mongolian and Chinese, and demonstrate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oken Chinese at that time. The redundant forms are fairly common in documents based on Chinese metaphorized from Mongolian, and are sometimes seen in Chinese literatures not metaphorized from Mongolian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et the redundant phenomenon and the redundant patterns eventually lose trace in standard Chinese language. The study of the redundant phenomenon will not only help us identify the origin of some grammatical forms in Chinese documents in the style of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Mongolian, but als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tate of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Mongolian and Chinese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which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tical profile of northern Chinese at that time.

[Keywords] Mongolian Chinese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the style of literal translation from Mongolian redundant phenomenon language contact

(通信地址: 010022 呼和浩特 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